

《钓鱼岛问题的核心》评介

徐 斌

—

近年来,由于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领土争议问题上的种种做法,导致中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奥巴马在今年4月的亚洲之行中,首次公开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显示出美国积极支持日本的姿态,使得安倍政权更加有恃无恐,不仅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认真反省,反而大开倒车,四处游说,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给中日关系的改善制造更多的政治障碍。中日关系不断恶化的症结之一在于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一些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的日本学者相继出版了一些论著,讨论钓鱼岛问题的起因与解决之道。这其中就包括本文所要介绍的矢吹晋。

矢吹晋,1938年生,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先后担任过《东洋经济新报》记者、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和东洋文库研究员等职,退休后创设“21世纪中国总研”研究所,现任该所网站的主编。

2013年1月,花传社出版了矢吹晋的著作《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何方》。^①该书就中日钓鱼岛争端的起因作了深入探讨,认为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有意篡改了中日建交谈判时的日方记录,否认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与周恩来、邓小平曾达成的“搁置争议”的默契。该书还大量利用美、日、中三国外交文件,深度分析了美国因素,尤其是《日美安保条约》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围绕钓鱼岛问题研究,作者先后出版了三部论著。除本书之外,其他两部著作分别题为《“中美国”——美中勾连与日本的前进道路》和《钓鱼岛冲突源自“归还冲绳”——作为日美中三角关系顶点的钓鱼岛》。^②这三部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作者在考察日中关系过程中始终强调“美国”因素。

二

《钓鱼岛问题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何方》一书共分11章,外加资料篇附录,主要汇集了作

①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花伝社、2013年。

② 矢吹晋「チャイナ: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矢吹晋「尖閣衝突は沖繩返還に始まる——日米中三角関係の頂点としての尖閣」、花伝社、2013年。

者近两三年来钓鱼岛问题研究和中日邦交正常化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且多是创新之作。作为一部有针对性、时效性的学术论著,本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矢吹晋曾对中国记者解释道:“我察觉到钓鱼岛问题的严重性,……感到日中关系面临严重危机,并愤慨于被大肆传播的日本政府御用学者的谬论得不到纠正。”^①正是带着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作者撰写了本书。书中值得注意的一些主要论述和观点新颖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否认中日双方在“搁置争议”问题上曾达成默契,日本政府篡改两国首脑的会谈记录

作者在该书的首章以“钓鱼岛外交谈判过程的历史真相——搁置争议的默契不存在吗”为题,详细梳理了20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谈判过程中,两国首脑围绕钓鱼岛主权问题展开的对话内容。其中,涉及田中角荣、竹入义胜与周恩来的会谈,邓小平与园田直的会谈,还包括邓小平在东京日本记者协会发表的讲话,大平正芳和园田直在日本众议院的证言,孙崎享、栗山尚一等外交官员的发言以及《读卖新闻》社论等内容。通过对上述会谈记录、发言文本的爬梳和解读,作者指出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确存在搁置争议的默契。在这一章当中,作者将张香山(曾任中国外交部顾问)的回忆录和日本外务省保存的会谈记录进行认真比对,从中发现日方当事人篡改了两国首脑的会谈内容,并作为档案保存了起来。例如1972年9月27日,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举行第三次会谈,田中角荣主动提及钓鱼岛问题,当时周恩来建议暂时搁置,得到田中角荣的赞同。根据2000年日本外务省公开的记录,双方表述如下:

田中总理:您对钓鱼岛怎么看?不少人向我提到这个问题。

周总理:这次不想谈钓鱼岛问题。现在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因为发现了石油,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台湾和美国都不会把它当回事。^②

矢吹晋发现,更多的材料显示谈话的一些具体细节被故意省略了。现在的日本政府正是根据这份“省略”后的文件认为,周恩来说不想谈,表明中方主动放弃钓鱼岛的主权,因此中日间不存在领土争议,更没有搁置争议的共识。

其中一份是时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的证言,他本人作为记录员出席了那一次会谈。他的表述收录在《记录与考证——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会谈》^③一书中。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周总理说,“终于快结束了”。但是,田中首相说,“不,还有问题没谈”,提出了钓鱼岛问题。周总理说,“如谈这个问题,双方都有很多话要说,首脑会谈就会无休无止,所以这次还是不谈吧”。田中首相说,“那也是。那就再找机会吧”,会谈就此全部结束。^④

可见,桥本的回忆内容与外务省档案有明显不同。另一份材料是中国外交部顾问张香山的回忆文章,发表在《日本学刊》上,题为《中日复交谈判回顾》。同为会谈的出席人员,张香山回忆录的内容则更为详尽:

田中:我还想说一句话,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态度如何?

^① 何培忠:《尊重历史事实 解析钓鱼岛问题——当代中日关系史专家矢吹晋教授访谈记》,《国际中国研究动态》2013年第6期,第8页。

^② 转引自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27页。

^③ 石井明、朱建荣、添谷芳秀、林晓光编《記録と考证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岩波書店,2003年。

^④ 转引自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28页。

周总理: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

田中: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

周总理:对!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作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

田中: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

周总理: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转移^①后来谈。

田中: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②

认真比较以上三份资料,可知中日首脑确实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时达成了搁置钓鱼岛争议的默契。日方外事人员在建档时删去了会谈的核心部分,即两国领导人在“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上达成的共识。不应该犯的失误在1978年8月10日举行的邓小平与园田直会谈后又一次出现,外务省档案中有关钓鱼岛会谈的内容也被删除了。不可思议的是,相关内容却在园田直本人退休后接受媒体专访时讲了出来,中方当事人张香山的回忆录可为之佐证:

邓小平副总理: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放几年不要紧,很可能这样的问题,几十年也达不成协议。达不成,我们就不友好了吗?要把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慢慢来,从容考虑。我们两国之间是有问题的。我们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处境不同,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同样语言。但是我们间共同点很多,凡事都可以求大同存小异。我们要更多地寻求共同点,寻求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相互配合的途径。条约的性质就是规定了这方向,正是你说的一个新的起点。

园田直外相:您谈了这个问题,我作为日本外相,也不能不说一点。如果不说,回去就不好交代。关于日本对尖阁的立场,阁下是知道的,希望不再发生那样的“偶然事件”(指中国捕鱼船队,一度进入钓鱼岛海域)。

邓小平副总理:把这样的事情摆开,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找到办法,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总会找到办法解决的。^③

由此,作者指出,以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等为首的日本外务省官僚原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所有会谈记录,但是,他们却对会谈记录进行随意简化或删改,这是极其严重的作伪和外交信用问题,是造成中日双方互不信任的主要根源之一。上述研究成果的发表在中国相关领域引起了关注。

(二) 日本的侵华战争道歉问题是导致中日互不信任的一个主要因素

作者在书中详细分析了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遇到的三个主要问题,即“结束战争状态”的认定问题、“战争赔款”问题和日方就侵华战争道歉问题。9月25日,田中角荣到访北京,经过双方不断的沟通与交涉,就道歉用语问题田中表示“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修改。”最终,在双方发表的正式文件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④

可是,事后在日本外务省会谈纪要里根本找不到田中角荣关于“谢罪”的文字表述。不仅如

① 原文如此。

② 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第47页。

③ 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版,第90—91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1972年9月30日,第1版。

此,随着(曾亲自见证这段历史的)田中角荣的下台和大平正芳的突然去世,这段历史也不再为日本人所提及。针对此事,矢吹晋指出:由于外务省官员的草率和僵硬应对,致使中日双方的互信难以建立,这一现象一直持续至今。为探究这一段历史的真相,矢吹晋曾于2003年9月到访位于北京毛家湾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查阅资料,并与中国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国学者的充分肯定。

(三)批驳日本主要媒体与御用学者有关钓鱼岛争端的错误论调

作者以大量的篇幅批评日本部分新闻媒体、研究人员与外务省官僚,认为他们相互串通,发表了许多有违史实的文章或著作,误导了日本民众。其中对服部龙二所著《日中国交正常化》^①一书批驳得尤为突出。服部龙二,中央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其所著《日中国交正常化》一书先后获得日本《每日新闻》社设立的“亚洲太平洋奖”和《朝日新闻》社设立的“大佛次郎奖”,在日本社会反响较大。服部主要通过对外务省外交档案的分析和解读,考察1972年中日建交谈判的历史过程,并从日本政府立场出发积极评价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日本高层及涉外人员对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贡献。矢吹晋认为该书主要观点严重歪曲历史,有为外务省官僚“歌功颂德”之嫌。围绕钓鱼岛问题,服部主要观点有三:1. 在谈判过程中压根就没涉及钓鱼岛议题;2. 中方实际上已经放弃领土主张的事实并非不可理解;3. 建交谈判时中方没有明确提出领土主张,现今却要将钓鱼岛纳入中国的“固有之领土”,这种行为不可理解。对此,矢吹晋批驳说:“服部完全无视中国方面外交记录,只照搬栗山、桥本(外交官)的那些自吹自擂的光荣史,基本看不到日中会谈过程中中方的种种应对”^②,这不是一名学者所应有的学术态度。^③服部在论著中不但无视中方档案资料,甚至连中国政府的公开主张也不触及,这种无视交涉对方任何意见的研究方法蛮横至极,其姿态不亚于前外相前原诚司在国会所做的发言。^④

此外,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还涉及如何认定“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谈判双方因《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的存在,就“结束战争状态”的时间确定及文字表述发生论争,僵持不下。服部龙二仅凭对三人(中国课课长桥本恕、条约局局长栗山尚一、大平正芳外相女婿森田一)所做的简单采访,就将所有提案和促成双方最终达成一致的功劳都记在桥本、栗山二人身上,一味地“歌功颂德”,完全无视中方的有益提案和中方人员的努力,尤其是杰出外交家周恩来总理的智慧和决断。对此,矢吹晋提出了批评,他说:“该书存在致命性的缺陷,即作者无视中方谈判记录,仅仅浏览和参考了一些翻译过的材料。……作者怠慢了基础性的文献考证工作,仿佛在创作一部外交谈判作品一般,这种失误在书中随处可见。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研究态度。”^⑤与此同时,矢吹晋又针对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的《日中关系史1972—2012》(第1册 政治篇)^⑥一书提出了质疑。他说:“该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考察1972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而作者井上正也在文章中只字不提张香山这个人,可见这又是一篇仅参考日方资料的有缺陷的文章;第四章主要探讨1974年至1979年之间的日中外交关系,作者若月秀和既不参考园田直前外相所著《世界、日本、爱》一书,也不提及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东京记者会上所作的发言。我们无法感受到这些青年学者真的努力

①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

②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97頁。

③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100頁。

④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92頁。

⑤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102頁。

⑥ 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関係史 1972-2012 I 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

发掘过中方史料,这些仅依靠二手、三手资料撰写出来的文章不应该被视为合格的论文。”^①另外,对于川岛真所著《钓鱼岛问题的话语空间》^②一文,矢吹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川岛真将田中首相和周恩来总理经过会谈形成的‘搁置争议’的默契,认定为“中国论客的主张”。^③上述日本主流学者对钓鱼岛问题所持的片面的、非客观的态度,让矢吹晋对未来中日关系走向感到十分忧虑。

(四)对立与合作、遏制与互动是美中关系的基调,《日美安保条约》保护“尖阁诸岛”值得怀疑

本书有两个章节系统考察和研究当今美中关系,以及《日美安保条约》在钓鱼岛冲突中如何规定美国必须承担的义务。首先,作者从经济一体化视角对美国经济二重结构特征、美中贸易及美日贸易关系进行比较和分析。指出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同以往,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也就是说“高度消费型的美国经济”是由“高度储蓄型的中国经济”支撑的,而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又迫使中国继续选择增购美国国债,以确保巨额外汇储备不致受损。在经济上美国通过举债的方式掌控着世界,而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则高调声称“重返亚太”,并加快构筑亚洲再平衡格局。这一切似乎都是针对中国。但是,若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美中经济关系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美日经济关系,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较之《日美安保条约》的重要性来的更大,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更是如此,“中美国”的结构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前迈进。作者告诫日本政府一定要看清这一趋势,及时调整对中外外交策略,不要过于相信《日美安保条约》提供给日本的保障。

就《日美安保条约》能否真正保护“尖阁诸岛”这一敏感议题,作者仔细解读了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表明的《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款适用于钓鱼岛的立场,认为该项条文除了首次使用“尖阁诸岛”来指称钓鱼岛外,较之以往美国一贯坚持的立场并无任何新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对日本的偏袒和明确警告中国的意图。另一方面,美国也并没有公开表示在此问题上愿与中方为敌。理由就是美方一再强调:对钓鱼岛最终的主权归属“不持特定立场”,只是认为钓鱼岛“处于日本施政管辖之下”,“第三方的单方面行动不会影响美国的这一立场”。^④作者还对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1946年1月29日美军发布的第677号训令以及1953年12月25日美琉球民政府发表的第27号公告等三份文件进行仔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文件虽然对相关海域做出了经纬度划定,但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礁的具体名称并未体现在文本中,甚至美日双方的议事录中也未体现。这一点足以说明当时的日本对钓鱼岛的认知其实存在很大的模糊性。之后的《旧金山和约》及其议事录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国学术界也早已有不少专家学者进行过探讨,并持相同的看法。但在日本国内,由于日本政府和媒体的误导性宣传,一般日本民众并不知晓上述具体内容所含的真意。作者在该书中特别指出这些,目的在于提醒日本民众。

作者援引美国参议院冲绳问题听证会记录及其附属文件来研究钓鱼岛问题。他认为,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十分清楚在台湾海峡和钓鱼岛海域发生危机的状况下,《日美安保条约》赋予美国的具体义务。这些附属文件一再显示美国“归还冲绳”时并没有把主权“交还”给日本,其中的缘由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有密切关系。针对美日的《归还冲绳协定》,台湾当局向美国提出抗议,并在国会

①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108頁。

② 川島真「尖閣諸島問題をめぐる言説空間——中国における歴史認識」、『UP』483号、2013年1月。

③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108頁。

④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167頁。

展开游说努力。美国为在日本与台湾这两个亚洲“盟邦”之间取得平衡,才做出所谓“施政权”和“潜在主权”的不同诠释。这种两面“下注”,操纵地缘政治的手法在无形当中成为海峡两岸探讨共同应对钓鱼岛问题的隐形障碍。矢吹晋在解读蒋介石日记和“中华民国”外交档案基础上得出这一看法,在海峡两岸学术界也引起了密切关注。作者认为奥巴马政权虽然一再表示《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款规定适用于钓鱼岛海域,但是一旦危机爆发,驻日美军能否真的出动增援日本,还须通过美国国会协商后决定。加之,目前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相互依存度日益增高,作者认为部分日本媒体和民众所期待的那种美日中三国的“钓鱼岛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日本政治家和官僚刻意将“施政权”与“主权”划等号的做法是在欺骗日本民众,导致日本民众一直以来就认为日本拥有对钓鱼岛和冲绳地区的完全主权,当中国大陆、台湾提出正当的领土主张时,产生普遍的反中抵触情绪,民族主义开始在社会中蔓延。他认为:日本对钓鱼岛的领有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背景下,通过所谓“无主地先占”论实施的有效支配,在国际交涉中虽有一定的优势,却无法以此否认历史,否认中国对钓鱼岛领土的潜在主权要求。为此,他提出:要实现东亚地区和平共存、共荣,唯有当局回归到“承认主权共有,协商资源分享”的外交谈判之路上来。

(五) 依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隶属于台湾的钓鱼岛原本就应一并归还中国

作者在该书第四章详细阐述了自己对钓鱼岛问题的基本认识。他秉持“论史结合”手法,以史实支撑论点,以论点透视现实。作者将当前不断恶化的日中关系形象地比作被开启的“潘多拉盒子”。盒子里有三重结构,围绕钓鱼岛问题分别封存着三段历史。其中位于最深、最下一层的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强权吞并琉球,遭到宗主国清政府强烈反对的历史。时至今日,“琉球处分”问题依旧是中日近代史上的一个悬案。^① 封存于第二层中的历史是,二战结束前后,依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隶属于台湾的钓鱼岛原本应一并归还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却因美军对琉球群岛的占领和“接收”没能实现。之后,其“施政权”又被美国私下移交给日本,造成后来日本实际控制的“事实”。封存于最上层的历史正是上文所述,40年前的田中角荣与周恩来会谈,以及36年前的园田直与邓小平的会谈曾经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却为现在的日本政府断然否认。“潘多拉盒子”的最上一层被日本政府以“国有化”的愚蠢行为所揭开,之后的日中关系一步一步走向危机的边缘。

(六) 借鉴海峡两岸的“搁置争议”的做法,建议协商达成“一岛各表”解决方式

作者在书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推荐友人冈田充的著作《“尖阁诸岛问题”——领土民族主义的魔力》。^② 冈田充,资深记者,曾经在香港、莫斯科、台北担任共同社支局长,后成为共同通讯社论说委员。冈田充在其著作中指出,日本野田内阁针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措施是导致中国强势应对的直接因素。中国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又让日本政治家和媒体借机在国内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日本政府则乘势迅速增加军事力量及其部署。日中双方相互刺激,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造成严重的“安保”困境。矢吹晋援引冈田的论点说,600年前中国福建移民曾迁居琉球,400年前同样是福建移民又迁居台湾,那时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在这个海域内谋求生存与发展,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境或国界意识。从海峡两岸的“一中各表”“搁置争议”“和平发展”的模式得到启发,作者认为有可能通过去国家化、去主权化的方式来处理钓鱼岛争端问题,具体做法就是“一岛各表”,由日本的冲绳、台湾的宜兰和中国大陆的福建具体实施共同管理和合作开发。这一观点极具创意性,虽然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却值得思考。

^① 矢吹晋「尖閣問題の核心——日中関係はどうなる」,11頁。

^② 岡田充「尖閣問題——領土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魔力」,蒼蒼社,2012年。

三

纵观全书,读者可以明显体会到作者研究视角的多元性、针对性。作者主要从中、美、日三国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的视角阐述钓鱼岛问题的核心内容,这也许与作者本人所从事的专业和与职业(经济学教授)有密切关系。总的来说,该书是了解钓鱼岛问题以及中日关系的一部佳作,可资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矢吹晋的一位友人——村田忠禧(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①,也是日本著名的钓鱼岛问题专家。村田忠禧的专著《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一书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知。该书与本书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单纯的史学角度,最大限度地运用各方史料来深度考察钓鱼岛历史主权归属问题。作者主要引用了明治时期日本外务省、内务省等政府机构的档案文献以及琉球、日本图籍,在详细分析和考证的基础上,指出部分政府文书歪曲历史事实的真相。在这一点上,矢吹晋做出了同样的努力,他通过客观冷静的比较研究,揭示了日本外务省为否认日本曾默认“搁置争议”的事实篡改了会谈记录。两位学者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值得我们敬佩。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像矢吹晋、村田忠禧这样尊重历史又衷心期盼日中关系和平友好的学者越来越多,诸如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毛里和子,琉球大学的上里贤一和西里喜行等一些学者都纷纷从不同角度呼吁重新审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呼吁日中两国(包括中国台湾地区)重新搁置领土争议,通过对话与协商方式实现对钓鱼岛的“共同主权、联合管理、共同开发、资源分享”。他们的想法和倡议如能得到更多的日本民众所理解、认同和支持,将有助于化解日趋恶化的中日关系。最后,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日本的专家学者都没有明确主张钓鱼岛领土主权属于中国。

[作者徐斌,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作者在创设“21世纪中国总研”研究所时,村田忠禧教授是主要支持者(创立赞同者)之一。2003年9月作者曾与村田忠禧教授一道访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陈晋等中国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二人也曾多次一同出席在台湾召开的学术研讨会。